

1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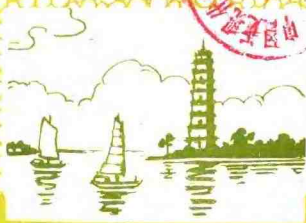
東莞文史

資料選輯

第六期



第1目
第2、3、4、5目有自



東莞縣政協文史組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东莞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期目录

- 一、徐亦良老师二三事……………何炎燊（1）
- 二、记王宠惠先生……………张寿祺（5）
- 三、王宠惠籍贯考……………王励吾（9）
- 四、陈伯陶传……………杨宝霖（13）
- 五、东莞名中医谱……………袁治平（22）
- 六、蒋光鼐将军的军事韬略和轶事十则……………王励吾（38）
- 七、居巢在可园……………张铁文（55）
- 八、林则徐在虎门
——查办海口事件……………张东明（61）
- 九、石龙史话②
——石龙的吏治……………黄震杜（66）
- 十、东莞胜景名山
——宝山石瓮……………张俭东（68）
- 十一、壬申山洪爆发袭莞城……………王健（72）
- 编后话

徐亦良老师二三事

何炎燊

徐亦良老师乃吾莞教育界名宿，从事粉笔生涯，逾五十载。春风化雨，桃李满门，最为邑人称道。四十年代初，余以医见知于先生，为忘年交，后在城南小学与先生共事数载。乃知先生不独高风亮节，工诗能文，可几于陶靖节；而愤世嫉邪，横眉矫首，且有类郁离子。一领青衿，嶙峋傲骨，求诸晚近，不可多见。今记先生轶事数则，皆余亲见亲闻，而世所鲜知者，以志景仰之忱云尔。

(一)

1944年，先生执教于漳澎私塾。腊月，大天二莫贤、老虎安等酬神祈福，大排筵席，欢宴亲朋，先生亦与焉。酒酣，先生喟然叹曰：“君等酬神，实为不智。”众愕然问故。先生曰：“上帝事忙，人间偌大，常处理不到，故善恶果报，时或愆期。今乃具牲醴香烛，上告于天，且数乐鞭炮，声震霄汉，惊帝座矣。上帝若命天官稽查，恐于君等不利耳。”语出，四座震惊，大天二勃然变色，人皆为先生

危。惟以先生道德文章，为世所重，大天二未敢遽然下手。先生即辞馆返家，作《漳澎释馆》七律一首。其颌联云：“恋栈只为残豆拌，寻巢休向故林飞”，以示决心弃此鸡肋。结联云：“晨起携将琴剑返，沿途细雨苦霏霏”，盖感叹沦陷区之世道艰难也。

(二)

抗战胜利后，先生迺返整峙塘祭祠，得遇国民党将领徐景唐。依族谱排辈，先生为叔。寒暄毕，先生笑谓景唐曰：“闻汝晋升为广州行营副主任，然乎？”曰：“然”。先生曰：“行营主任之职守，乃剿匪安民，然乎？”曰：“然”。先生正色曰：“为何至今尚未见官兵剿匪也？”景唐曰：“绍叔（先生名绍业）岂不闻国府已明令戡乱救国，剿除共匪乎？”先生摇首曰：“不然，国共两党乃政见不同耳！竟至兵戎相见，同室操戈，殊属可悲。至于杀人越货，霸占民田，淫人妻女者，吾民乃称之为匪，奈何任其逍遥法外耶？”景唐曰：“若民众告发，真有此辈，政府自当惩办也。”先生竖眉瞪目，厉声曰：“汝真不知群匪所在及其尊姓大名乎？敢与吾指天为誓乎？吾知此辈与尔曹早已沆瀣一气矣！吾侪草野小民，安敢告发？诬告反坐之罪，小民恐承受不起耳！”景唐为之语塞。

(三)

某日，东莞明伦堂督学李觉清驾临城南小学“视察”。其时私立小学校长若闻督学将至，多惴惴不安，先命生徒清扫校舍，更换衣冠、整肃以待。先生则漠然置之，一如平日。李至，入课堂，听先生授课。先生讲授毕，问学生曰：“吾所讲者，尔曹皆领会乎？”众曰：“诺”。先生曰：“古人谓‘圣乐一奏、百兽率舞’，言音乐之神妙，能感动禽兽也。吾今日讲课，虽不比圣乐，亦能感人，故不独汝等心领神会，而猪狗来听之，亦静坐低头也。”李闻言，悻悻而去。余心不安，谓先生曰：“老师今日所言，未免太过，须知此人实权在握……”先生搔髭大笑曰：“汝自怕他，我却不怕。今日李公始知教书匠中，非尽是软骨头者。且看他将奈吾何！”

(四)

先生有饮茶癖，一日清晨，与余品茗于荔香园。寒儒对坐，一盅两件而已。座中有国民党大小吏目五六人，皆衣西装，登革履，佩玉坠，戴金表；香茶美点，杂然前陈，谈笑风生，据案大嚼。先生以箸击壶，的的作响，茶客闻声，多停杯注视。先生乃大言曰：“吾为报纸所欺矣。报载公务员薪金微薄，衣食不给，犹能克己奉公，忠于职守云云。岂知

一登衙门，声价十倍，蛇有蛇窝，鼠有鼠路。试看座中多少龙宫水族，珠光宝气烨然，可知报章所云，徒为彼辈涂脂抹粉而已。”余恐先生狂言惹事，乃相促下楼。回顾座上诸公，却面无惭色。真是“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也。

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观先生之言行，亦可想见其鲠直不阿之风度。故君子礼重之，小人则衔恨之矣。解放后，先生以垂暮之年，当选为我县第一届人民代表，此乃党与人民对先生一生行状之最正确评价也。

记王宠惠先生

张寿祺

王宠惠先生，别字亮畴，原籍本县太平镇人。父王旭初，乃一虔诚之基督教徒，曾长期担任基督教《圣经》宣讲师职务，并与孙中山先生相友善。

1880年，王旭初夫妇讲道于香港时，生得王宠惠，后回太平镇居住。及长，王宠惠又随其父往香港，就读于皇仁书院，以成绩卓著，思考敏捷，闻名于当时港岛学生界。

1899年，王年仅19岁即出任上海南洋公学教习（按：南洋公学乃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先生所教的英文课，深受学生欢迎。

1900年冬，适值浙、皖革命党人秦力山等在安徽大通（铜陵市西南角）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失败，为清方追捕甚急，秦力山千方百计逃出虎口，逃至上海，求助于先生，先生尽力为之遮掩，秘密将之收藏，继后又送之登舟东渡日本。

1901年，先生年方21岁，秦力山、沈翔云等于日本东京创办《国民报》，特邀请先生来日本，担任该报英文撰述。先生在东京常以英文为《国民报》撰述时论，宣

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共和等理论；与梁启超保皇党在日本所主办的报刊，主张君主立宪的针锋相对，遂名噪一时。

梁启超方自美国檀香山返东京，闻先生大名，特函约先生赴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叙谈，先生马上复书责梁失礼，谓梁启超既是保皇党魁，理应礼贤下士，今乃欲以一纸书信，使人奔走，殊令受者难堪云云。梁启超初颇傲慢，对来书措词大不以为然。后经深思，才知自己不对，特作书向先生谢过。

梁在当时日本东京，曾编有《英文汉读法》一小册子出版，常自吹自擂谓读过此书，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报。先生闻之深耻其大言不惭。及后与梁启超会晤，先生详询此书内容及结构，并一一指出其书语法上修辞上错误，列举其不当之处，竟达数十点之多。这时，梁启超面红耳赤，自后再不敢与人言“通英文”，更不敢提及《英文汉读法》此书。

1902年，先生自日本赴美国，入耶鲁大学攻读法学。1904年，孙中山先生到美国纽约，进行革命宣传，并发表一篇对外宣言《革命潮》（即《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这篇英文名著乃出自王宠惠先生的手笔，足证其英文写作水平之高。

1907年，先生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以后，又从美国转赴欧洲，继续研究法学。并考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在德国又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并将德国“民法”一书译为英文出版，曾一度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学系的通行

教本。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

1915年开始，袁世凯积极图谋复辟帝制并向日本进行卖国外交；是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袁世凯操纵之下于北京举行所谓“国体投票”，制出所谓“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推戴书，于十二月十一日向袁世凯劝进。同日袁贼谦让一番退回推戴书。这时，袁记一帮政客更大卖气力，于是晚再向袁贼呈递劝进书。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十三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百官朝拜，正式复辟帝制，并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通令把1916年1月1日起改元“洪宪”。

这一段时间，王宠惠先生在上海积极策动反袁斗争，就这一点来说，他不愧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

以后，先生历任当时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及司法院长。1928年至1933年，在欧洲被聘任为瑞士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在职六年期间，以其丰富学识，敏捷思路，为国际法庭权威以及西方法学界所敬佩。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对当时西方法学界认为中国缺乏法学权威之士的偏见，作出一个极有力的反击。

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代表当时中国出席联合国创立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成为联合国创立人之一。五十年代初，他移

居于我国台湾省，后以年老多病，于1958年病逝于台北。

综观王宠惠先生一生成就，在法学方面贡献至大，他是我国第一位蜚声于西方法学界，为西方所推重的大法学家。在国际法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先生对家乡极具感情，其早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著作中，概书上“东莞王宠惠著”六字。又闻于1932年间，他自海牙至法国乘船东返探亲，船至星加坡泊岸时，星加坡总督以及当地高级官员和华侨领袖均到码头欢迎，星加坡东莞同乡会亦派出一辆陈旧小汽车载人到码头欢迎。王宠惠登岸后，与欢迎者一一握手，寒暄数句，离开码头时，既不坐总督府派来的漂亮小汽车，也不坐著名侨领的豪华小汽车，却钻进东莞同乡会那部“老爷车”里去，挥手命司机直开往东莞同乡会。他这点举动，使在场欢迎他的一群西洋显贵大为愕然。他到了“东莞同乡会”与同乡见过面以后，才驱车往总督府拜会星加坡总督；晚上出席当地侨联为他所举办的酒会，然后返回船。当时星加坡华侨说：他是一位东莞佬嘛！当然先到家（同乡会），然后才去总督府嘛！

先生夫人朱学勤女士仍居于我国台湾省，公于大宏，乃台湾省一著名建筑师，亦蜚声于西方建筑学界。

1985年1月于中山大学

王宠惠籍贯考

王励吾

王宠惠，曾任过设在海牙的“万国法庭”的首席法官，精通几国语言，后来又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解放前的几十年里，在所有的东莞人中，要算他的官运最享通。

然而，王宠惠的仕途生涯虽是这样显达，他在国内外又是那样赫赫有名，可是，对于他的籍贯，在东莞地区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须用一句话就够了：王宠惠原籍是东莞县虎门区南栅乡西头村人。

为了使读者特别是持不同看法的读者信服，下面，笔者就把能够证明王宠惠籍贯的几点依据摆出来，就教于有关方面的同志。

解放前，每逢过春节，南栅乡南头村前的“翠溪公祠”的大门口都挂着两个象禾桶那么大的灯笼，从年初一挂到正月十五。左边灯笼上的四个大字是“外交部长”，右边的灯笼上的四个大字是“陆军中将”。这“陆军中将”指的是被国民党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曾任过“东江游击司令”的王若庸，而“外交部长”指的是王宠惠。据老一辈人说，这两

个灯笼，从王宠惠当上外交部长的那一年春节开始挂，直到一九四九年的春节为止，年年如此。如果王宠惠原籍不是西头村人，就算西头村的人最厚颜无耻，也不敢挂这么长的时间吧？况且西头村虽只是个五六百户人家的村庄，但从前清直至解放前的几十年间，也出过不少达官贵人，其中就有中过进士的王惇伯，有在保定军校当过蒋介石老师的王庄池，有以廉洁奉公、刚直不阿而出名、曾任过广东省民政厅长和负责治理黄河的王应榆。以至使马师曾、红线女、白驹荣这样的粤剧名演员也曾经跑到西头村来一连演了几天几夜的戏。很难设想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会做出冒认名人籍贯这样的荒唐事来。

这是可以证明王宠惠原籍是南栅西头村人的第一个依据。

为了认真而又彻底地弄清王宠惠的籍贯，我曾分别走访了十多个地位不同，职业不同，学识不同，而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的西头村人。使我不胜惊讶的是，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却是如此惊人地相同！也就是说，除了叙述的口气，各人所用的词语略有不同之外，所叙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根据众人提供的情况，笔者把王宠惠发迹前的经历简单列具如下：

王宠惠原是南栅乡南头村人，但距离他几代之前就迁移到虎门区的官涌王屋村居住。一直到他祖父那一代，他家中的景况仍然是过得去的。但是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家景就开始变坏了。不到两三年时间，王宠惠祖父遗留下来的一点产

业被花光了。后来，全家被赶出官涌王屋村，流落在太平镇街头。没多久，王宠惠的父母相继去世，王宠惠也被送进了孤儿院。恰巧在这段期间，有一个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在太平镇一带传教布道的外国传教士，看见王宠惠聪明伶俐，十分喜欢他，就把他领了出来，先是让他在当地就学，回国时又把他带走，继续供他读书，一直到王宠惠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就这样，王宠惠才从一个举目无亲的孤儿，逐步地成为后来那样显赫的人物。王宠惠发迹后直至当上外交部长，只回过官涌王屋一次。那一天，太平镇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去码头和在主要的街道上“瞻仰”王宠惠的“丰采”。官涌王屋村的人不但再也不提王宠惠全家被赶出村的事，而且还大排筵席来接待他呢。

这是可以证明王宠惠原籍是南栅乡西头村人的第二个依据。

笔者经过调查，发现到目前为止，虎门、长安一带凡是姓王的村落（包括官涌王屋村）或人家，原籍都是南栅乡南头村人，只是后来才陆续分支出去的。既然这样，王宠惠一家原先的籍贯当然也应该是南栅乡而头村了。

这是证明王宠惠原籍是南栅乡南头村人的第三依据。

综上所述，王宠惠原籍是东莞县虎门区南栅乡西头村人，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奇怪的是，不知什么缘故，王宠惠发迹后，却从没回过座落在回头村北边的“王氏大宗祠”拜祖宗。笔者揣测，这一方面可能同王宠惠在外国的时间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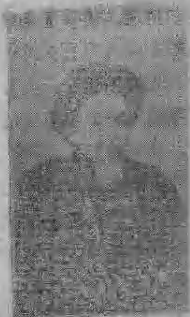
改变了宗教信仰有关系，另一方面大概是王宪惠认为，自己之所以发迹，不是靠王氏祖宗的在天之灵，而是靠外国传教士的提携之力吧。

陈伯陶传

杨宝霖

一、生平

陈伯陶，字象华，一字子砺，东莞凤涌人。父铭珪，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副贡，居莞城榜眼坊十九巷。咸丰四年（一八五四），红巾军起义于石龙，五月攻陷莞城，陈父往省告变，全家逃于增城仙村，陈父积极与东莞乡绅们办团练，配合东莞县令华廷杰镇压红巾军。咸丰五年（一八五五）正月，陈父回莞城，三月十七日，陈伯陶生于莞城家中。五岁，出就傅读，六岁，广东著名学者陈澧主讲东莞石龙龙溪书院，陈澧为陈父好友，伯陶遂拜陈澧为师。以后，陈澧主讲广州学海堂，陈伯陶曾往受业，伯陶的经学词章，受陈澧的影响颇大。十岁，通五经。一日，陈父之友，璠美的方文炳（字荣君，一字朔洲，东莞报功祠四君之一）与方应锡（字竹铭）来访，夜饮，见伯陶夜读，文炳出“半夜读书灯火细”命伯陶属对，伯陶应声说：“三更欹酒月轮高。”方文炳对方应锡说：“此佳婿也。”即与方应锡定为姻亲，陈父又将幼女许配文炳之子方维基。后伯陶之妻为



氏，即方应锡次女。不久，陈父携伯陶读书于罗浮山酥醪别院。弱冠，读书于莞城道家山（今莞城工人文化宫）。光绪元年（一八七五）游于痒（即中秀才），是时伯陶二十一岁。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乡试中式第一名（即解元）。这时陈澧主讲广州菊坡精舍，以对联赠之曰：“文章高似罗浮顶，科第连登会状元”。陈澧当时已七十岁了。乡试以后，伯陶上京准备会试，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十一月陈祖母刘氏及陈父隔十五日相继去世，伯陶奔丧回莞。此后数年，伯陶以教书所得，养母育弟妹，到弟妹婚嫁完毕，复出应试。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成进士。殿试，初置第一（即状元），因试卷中把“宣抚司”误写成“宣慰司”，被压在第十名之外，翁同和力争，谓此积学之士，改列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协修。后历官国史馆协修、总纂。

当甲午战起，这时李鸿藻闻英国助日本，就派陈伯陶微服到新加坡侦探虚实。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抵新加坡，不久，闻日本攻陷大连、旅顺、威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遂返国。因病就医于家，明年五月回京。充云南贵州副考官。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伯陶自云贵回，这时工部主事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同乡关系，邀请陈伯陶入会，伯陶匿避。

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伯陶携眷南回。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二月，伯陶闻慈禧挟光绪逃奔西安，就从东莞起

程，奔赴陕西。和议成，随帝后还京。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为南书房行走，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四月，出为江宁提学使，六月，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十月回国，在南京推广实业高等学堂，创办学习外国语文的方言学堂，创立暨南学堂，招华侨学生至南京攻读。宣统元年（一九〇九）九月解任。十一月，再授江宁提学使。宣统二年三月，入都。时摄政王执政，既贪且黷，天下汹汹，革命火种，势在燎原，陈伯陶知事不可为，五月，弃官回莞。

辛亥（一九一一）九月，革命军攻破广州，东莞相继克复，革命军包围十九巷陈氏宅，伯陶设法逃到九龙，居虹棚。一九一三年二月，母叶氏卒，移居九龙官富场，署所居曰瓜庐。以著述终身。

一九一三年，内阁总理熊希龄，广东督军龙济光，着长张鸣岐致函致电请陈伯陶复出，伯陶拒绝。一九二二年十月，溥仪结婚，伯陶捐一万银元亲到北京入贺。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事于九龙寓所。

二、思想

陈伯陶的家庭教养、一生为官的经历，使他形成了守旧，敌视新事物的思想。八国联军侵伐我国以后，清政府一些比较开明的大臣企图学习欧美诸国，变法自强。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四）侍郎伍廷芳请开设下议院，陈伯陶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下议院既成，则横议蜂起，国事不可为矣。